

城市发展何以提升居民幸福感

——基于长江中游城市的组态分析

吕博文, 程 晨

武汉科技大学法学与经济学院, 湖北 武汉

收稿日期: 2026年9月17日; 录用日期: 2026年10月14日; 发布日期: 2026年10月22日

摘 要

在城市高质量发展与民生福祉提升协同推进的背景下, 提高居民幸福感对于城市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本文以长江中游城市群28个地级市为对象, 基于TOE框架, 运用fsQCA方法, 探究城市发展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多元组态路径。研究发现: (1) 居民幸福感受到多重因素并发影响, 技术、组织、环境维度的单一条件均无法单独构成高(或非高)居民幸福感的必要条件。(2) 实现高居民幸福感的组态路径有4条, 可归纳为三维协同、组织驱动、组织-环境联动三类模式, 并且技术创新产出、产业组织结构、创业活跃程度、区域开放程度是重要前因条件。(3) 导致非高居民幸福感主要包括多维缺失、组织-环境缺失两种类型, 技术创新产出、创业活跃程度、区域开放程度方面的短板成为主要限制性因素。据此, 围绕重视从技术、组织、环境多维协同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 采取因地制宜差异化发展模式, 强化区域一体化发展等方面提出了强化城市发展以提升居民幸福感的发展建议。

关键词

居民幸福感, 城市发展, TOE框架, fsQCA

How Can Urban Development Enhance Residents' Well-Being?

—Configuration Analysis Based on Cities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Bowen Lyu, Chen Cheng

School of Law and Economics, Wuh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Hubei

Received: September 17, 2026; accepted: October 14, 2026; published: October 22, 2026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coordinated advancement of high-quality urban development and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well-being, enhancing residents' well-being carries great significance for high-quality urban development. This paper selects 28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of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as research samples. Based on the TOE framework, it employs the fsQCA method to explore multiple configurational paths through which urban development affects residents' well-be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Residents' well-being is affected by the concurrent interplay of multiple factors, and no single condition from the technological, organiz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dimensions can independently constitute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high (or non-high) residents' well-being. (2) There are four configurational paths leading to high residents' well-being, which can be summarized into three modes: three-dimensional synergy, organization-driven mode, and organization-environment linkag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utput,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structure, entrepreneurship activity, and regional openness serve as critical antecedent conditions. (3) Non-high residents' well-being mainly stems from two types of configurations: multi-dimensional deficiency and organization-environment deficiency. Shortfalls i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utput, entrepreneurship activity, and regional openness act as primary constraining factors. Accordingl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to boost residents' well-being via urban development, including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promoting high-quality urban development through multi-dimensional synergy of technology, organization and environment, adopting differentiate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tailored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strengthening region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Keywords

Residents' Well-Being, Urban Development, TOE Framework, fsQCA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城市是承载着人民美好生活、实现共同富裕的核心空间载体。持续提高居民幸福感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截至 2025 年末,中国城镇化率达到 67.89%,城市发展正迈入提质增效的全新阶段[1]。长期以来我国高度重视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并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的核心理念,强调城市发展的根本目的在于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2],将居民幸福感作为衡量城市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尺。

当前,在数字技术发展、城市更新行动不断推进过程中,城市空间布局变化、产业结构调整、人居环境改善、公共服务优化等多重变革交织,都会影响到居民幸福感。一方面,技术创新发展、基础设施完善、创新创业活力都能够提高城市生活便捷度、活跃度,进而影响居民幸福感;另一方面,城市发展变迁是一个动态过程,在面对交通拥堵、就业压力、更新改造时,也会影响城市居民幸福感。现有研究多聚焦城市发展中数字技术[3]、就业形态[4]、公共服务[5]等单一因素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较少关注城市发展中多维因素并发的联动作用机理。而实践生活中,城市发展中的技术、组织、环境多维因素往往是交互作用的,其对居民幸福感会产生什么样的联动影响呢?

为回答上述问题,并考虑到 TOE 理论同时考虑内外部因素,能够较好解释复杂社会现象成因,可以应用于城市发展研究领域[6],并且城市发展中技术、组织和环境三维度要素的改变也会影响居民幸福感[7][8]。基于此,本文选取长江中游城市群 28 个地级市作为研究对象,基于 TOE 框架,借助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系统考察城市发展中的技术、组织、环境多维度因素对居民幸福感的组态影响,以期归纳实现高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发展模式,避免陷入非高居民幸福感的路径依赖,进而为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城市乃至全国城市发展促进居民幸福感提升提供有益参考。

2. 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2.1. 文献综述

(1) 城市发展的相关研究

作为各类经济社会活动的重要载体,城市是技术要素落地、组织架构调整、多元环境交互的综合作用场域[9]。从技术发展来看,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赋能城市发展成为重要趋势[10]。组织架构上,现代城市发展高度重视创新创业[8][11],积极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新业态、新产业发展[10][12]。环境配套方面,城市发展离不开各类软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并日渐重视提高城市发展的包容度、开放度[9][12]。发展至今,中国城市发展迅速,但仍面临产业转型、环境污染、发展不均衡等现实问题[13][14]。为此,以城市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现有研究强调能够围绕技术创新、组织结构调整、发展环境优化等方面来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10]。

(2) 居民幸福感的相关研究

居民幸福感是衡量地区民生的核心尺度,现有关于居民幸福感的研究主要包括现状测评、提升路径两个方面。现状测评包括从主观评价或客观测度展开,前者通过设置“您有多幸福?”或“您觉得是否幸福?”等问题展开[15][16];后者多从经济、文化、社会、民生、生态等方面构建指标评价体系来进行综合测度[17][18],例如从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生态环境、社会环境以及公共服务等方面构建居民幸福指数综合评价体系[17]。在提升路径上,持续提升居民幸福感对于微观个体、中观区域、宏观国家发展意义重大,为此,相关研究从微观个体层面围绕居民数字素养提升和社会比较心理疏导[15][19];中观区域层面,特别是城市发展层面强调推进城市更新、改善人居环境、优化公共服务[7][20];宏观层面,突出依托政策引导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推进数字化治理等来提高居民幸福感[17][21]。

(3) 城市发展与居民幸福感的关联研究

现有研究普遍证实,城市发展能够显著影响居民幸福感[17]。技术维度上,随着城市技术创新,数智技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便利居民生活、提高生产生活效率,影响居民幸福感[21][22]。组织维度,城市发展内部的各类教育、医疗、就业资源的优化配置会直接作用于居民幸福感[7],与此同时,产业转型升级也会通过改变就业岗位需求、居民收入水平来影响城市居民幸福感[18]。环境维度,城市内部各类软硬件基础设施如交通设施的建设、完善、更新等,也会对居民幸福感产生影响[7][23]。

(4) 研究评述

现有研究重视城市发展对提升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影响,但仍有值得进一步考察之处:一是在影响因素上现有研究多聚焦城市发展的单一因素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展开考察,导致难以刻画多要素联动形成的影响居民幸福感的组态规律;二是在分析框架上缺少一个整合分析框架,未能系统纳入多维度条件开展综合分析。

2.2. 分析框架

TOE 框架从技术、组织、环境三个维度对目标变量进行系统刻画,被广泛应用于科技创新、政府治

理以及城市发展等多研究领域中[24] [25]。城市发展是由技术创新发展与应用、组织活力激发与结构调整、创新环境营造与改善的综合过程,其目标不仅在于促进经济发展,而且也强调改善民生福祉与生活质量,提升居民幸福感。因此,TOE 框架能够较好解释城市发展对居民幸福感的多维影响,具体而言:

技术维度以技术创新产出和技术从业人员为代表,反映城市创新要素集聚水平和创新能力,其中技术从业人员能够为城市发展提供人才要素支撑,由此带来的技术创新产出能够进一步促进城市发展转型,并通过丰富数字化生产生活场景、提升就业质量,影响居民幸福感[3] [26]。组织维度中,产业组织结构和创业活跃度能够衡量城市资源配置水平与市场组织活力,突出城市优化产业组织架构、激励就业创业来影响居民择业就业方式与收入水平,进而影响居民幸福感[26] [27]。环境维度包括城市内部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区域开放程度,例如便利化的交通基建能够提升居民生活便利度,较高的区域开放度能够强化要素流动、扩大公共资源的可达性,进一步提升居民幸福感[28] [29]。也就是说,技术、组织、环境三类要素共同构建城市发展影响居民幸福感的重要作用维度。基于此,本文借助 TOE 理论框架,采用 fsQCA 方法,系统探究城市发展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多重组态路径。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对象

考虑到作为中国中部崛起战略的核心承载区,长江中游城市群是支撑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构建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的重要增长极,其战略地位突出;并且长江中游城市群包含的城市在创新能力、产业层级、开放水平、基础设施等方面差异显著,能够为挖掘不同城市发展对提升居民幸福感的多元驱动路径提供多样方案。因此,本文选择长江中游城市群 28 个地级市作为研究对象展开具体分析。

3.2. 研究方法

fsQCA 方法是一种将定性分析与定量逻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它以组态视角开展分析,突破传统回归分析聚焦单个变量净效应分析的局限,能够深层次揭示居民幸福感提升的多要素协同机制[30],为归纳不同的高幸福度城市建设路径提供支持。基于此,本文依托 TOE 分析框架,分别从技术、组织、环境三个维度选取前因条件,通过 fsQCA 分析来识别驱动高居民幸福感的城市发展组态路径。

3.3. 变量设置

3.3.1. 结果变量: 居民幸福感

居民幸福感是衡量城市发展民生成效的核心标尺,参考刘超等[3]、肖枝洪和钟林[18]做法,构建如表 1 所示城市居民幸福感评价指标体系,使用熵值法计算得到 2011~2023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 28 个地级市居民幸福感指数。

Table 1. Indicator system for evaluating urban residents' well-being
表 1. 城市居民幸福感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测度方式
经济发展	人均 GDP(万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 GDP 比重(%)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就业状况	二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
	城镇登记失业率(%) (负向)

续表

社会保障	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元)
	人均保费额度(元)
	万人拥有的执业医师数(人)
	每百人医院、卫生院床位(张)
教育条件	城市高校师生比(%)
	教育经费投入占 GDP 比重(%)
	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册、件)
生态环境	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PM2.5 年平均浓度($\mu\text{g}/\text{m}^3$)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3.3.2. 条件变量：基于 TOE 框架的城市发展

综合段永彪和杨青[6]、叶阁泽和黄山松[8]、王文彬等[25]的研究，基于 TOE 框架，从技术、组织和环境三方面选取表 2 所示的 6 个城市发展条件变量。

Table 2. Antecedent conditions of urban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TOE framework
表 2. 基于 TOE 框架的城市发展前因条件

目标层	指标选取	测度方式
技术维度	技术创新产出	绿色专利授权总量的对数
	技术从业人员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数比重
组织维度	产业组织结构	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
	创业活跃程度	注册企业数与常住人口数之比
环境维度	区域开放程度	实际利用外资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交通便利程度	人均道路面积

3.4. 数据来源

以 2011~2023 年长江中游 28 个地级市数据为研究样本，数据来源于相应年份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工商企业注册数据、CNRDS 数据库等，缺失值使用插值法补全。

4. 结果与分析

4.1. 数据校准

遵循 fsQCA 基本步骤，分别设置 25%、50%和 75%为完全不隶属、交叉点和完全隶属的锚点，来对所有变量进行校准，将原始数据统一转换为[0, 1]区间的模糊集隶属度，各变量校准阈值见表 3。

4.2. 必要性检验

对单一条件变量进行必要性分析，结果见表 4，各条件变量的一致性水平平均低于 0.9，表明单一条件变量不能作为导致高或非高居民幸福感的必要条件，因此组态分析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

Table 3. Calibration anchors for each variable
表 3. 各变量校准锚点

变量			锚点		
			完全隶属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
条件变量	技术维度	技术创新产出	5.5363	4.6587	3.8501
		技术从业人员	273.0861	229.0845	187.5684
	组织维度	产业组织结构	1.1000	0.8582	0.6573
		创业活跃程度	1.6413	1.1212	0.7599
	环境维度	区域开放程度	0.5219	0.3167	0.1717
		交通便利程度	24.7068	19.8050	15.1645
结果变量	居民幸福度		0.1157	0.1157	0.906

Table 4. Results of necessity analysis for single condition variables
表 4. 单一条件变量的必要性分析结果

单一因素必要性分析					
高城市居民幸福感			低城市居民幸福感		
条件变量	一致性	覆盖率	条件变量	一致性	覆盖率
技术创新产出	0.8095	0.7650	技术创新产出	0.3455	0.3422
~技术创新产出	0.3039	0.3070	~技术创新产出	0.7626	0.8075
技术从业人员	0.3925	0.3850	技术从业人员	0.7245	0.7447
~技术从业人员	0.7397	0.7192	~技术从业人员	0.4016	0.4093
产业组织结构	0.7146	0.7022	产业组织结构	0.3653	0.3762
~产业组织结构	0.3651	0.3544	~产业组织结构	0.7107	0.7230
创业活跃程度	0.7595	0.7459	创业活跃程度	0.3614	0.3720
~创业活跃程度	0.3605	0.3501	~创业活跃程度	0.7531	0.7664
区域开放程度	0.6856	0.6808	区域开放程度	0.4095	0.4261
~区域开放程度	0.4221	0.4055	~区域开放程度	0.6933	0.6979
交通便利程度	0.6268	0.6115	交通便利程度	0.4706	0.4811
~交通便利程度	0.4681	0.4576	~交通便利程度	0.6200	0.6352

4.3. 组态分析

组态分析参数设置上，参考徐芳和金晓燕[30]的研究，设置频数阈值为 3，PRI 一致性和原始一致性阈值均设为 0.8。表 5 呈现导致高居民幸福感的组态路径结果。

4.3.1. 高城市居民幸福感组态路径分析

通过对实现高幸福度的组态进行分析，共识别出 4 种组态，一致性水平均大于 0.96，总体一致性水平达到 0.97，原始覆盖率在 0.17 到 0.28 之间，总体覆盖度达到 0.48，符合组态分析的要求。进一步，对各路径核心条件、边缘条件进行梳理，可以将 4 条路径归并为三维协同模式、组织驱动模式、组织 - 环境联动模式三种。具体模式特征与作用逻辑如下。

Table 5. Results of configurational path analysis for high urban residents' well-being
表 5. 高城市居民幸福感组态路径分析结果

条件变量	组态路径			
	H1	H2	H3	H4
技术创新产出	●	●	▲	
技术从业人员	⊗	⊗	⊗	⊗
产业组织结构		●	●	●
创业活跃程度	●	●		▲
区域开放程度	●		●	●
交通便利程度	○	▲	▲	▲
一致性	0.9836	0.9803	0.9810	0.9675
原始覆盖度	0.2266	0.2723	0.1804	0.1792
唯一覆盖度	0.1674	0.1143	0.0224	0.0212
总体覆盖度		0.4833		
总体一致性		0.9766		

注：●表示核心条件存在；⊗表示核心条件缺失；▲表示边缘条件存在；○表示边缘条件缺失；空白表示该条件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

1. 三维协同模式

三维协同模式强调城市发展中技术、组织、环境三维联动能够引致高居民幸福感，该模式以组态路径 H1 为代表，表示无论是城市发展的技术、组织还是环境维度都存在核心条件，具体而言，组态 H1 表示，当技术维度中技术创新产出、组织维度中创业活跃程度、环境维度中区域开放程度作为核心条件时，即使技术从业人员、交通便利程度两个前因变量缺失，且无论是否有产业组织结构作为前因变量，都能够形成高居民幸福感。

此模式以武汉、长沙和南昌等发展基础较好的城市作为典型代表，强调通过技术创新产出赋能城市发展、创业活力激发市场动能、对外开放拓展发展空间的协同效应带动就业扩容、收入增长与公共服务提质，由此在技术、组织、环境多维联动下，持续提升城市居民幸福感。

2. 组织驱动模式

该模式以路径 H2 为代表，强调组织维度的产业组织结构和创业活跃程度均作为核心条件，同时技术维度的技术创新产出也是核心条件，辅之以环境维度的交通便利程度作为边缘条件时，即便技术从业人员这个前因变量缺失和有无区域开放程度作为前因变量，均能形成高居民幸福感。

组态 H2 路径以宜昌、株洲、黄石和新余等产业基础相对较好，但在人才储备方面存在短板的城市为典型代表。此类城市更多通过产业组织结构升级创造高质量就业岗位，提升创业活跃程度激发市场活力，叠加技术创新的产业提质效应来提升居民幸福感。此种发展模式下的城市，未来应在保持其产业发展优势基础上，从人才队伍引育、开放环境营造等方面发力来全方位促进城市发展，进而提升居民幸福感。

3. 组织 - 环境联动模式

该模式包含组态 H3 和 H4，均在组织维度和环境维度存在 1 个核心条件变量。此模式突出了产业组织结构升级和区域开放程度提升的核心联动作用，以及城市交通便利程度提升的辅助作用。而组态 H3 和 H4 的差别主要存在于技术创新产出、创业活跃程度两个边缘条件：其中组态 H3 以九江、常德为典型代

表，以技术创新产出为边缘条件；组态 H4 以襄阳、宜春为代表，以创业活跃程度为边缘条件。

组织－环境联动模式突出了产业组织结构升级与对外开放程度提升是强化居民幸福感的双轮驱动因素，能够为部分城市进一步围绕提高居民幸福感这一目标，夯实产业基础，优化产业布局，强化区域开放度和包容度提供可行的发展思路。

4.3.2. 非高城市居民幸福感组态路径分析

通过分析，进一步得到表 6 所示导致非高居民幸福感的 6 条组态路径，可以梳理归并为三维缺失型、组织－环境缺失型两种主要形式。

Table 6. Results of configurational path analysis for non-high urban residents' well-being
表 6. 非高城市居民幸福感组态路径分析结果

条件变量	组态路径					
	L1	L2	L3	L4	L5	L6
技术创新产出	○	○	⊗	⊗	▲	○
技术从业人员		●	⊗	●	●	●
产业组织结构	○	⊗		○	▲	
创业活跃程度			○	⊗	⊗	⊗
区域开放程度	○	⊗	⊗		⊗	⊗
交通便利程度	○		⊗	⊗		▲
一致性	0.9727	0.9694	0.9851	0.9266	0.9727	0.9694
原始覆盖度	0.3541	0.3303	0.1565	0.3058	0.3541	0.3303
唯一覆盖度	0.0324	0.0206	0.0097	0.0700	0.0324	0.0206
总体覆盖度	0.5831					
总体一致性	0.9371					

注：●表示核心条件存在；⊗表示核心条件缺失；▲表示边缘条件存在；○表示边缘条件缺失；空白表示该条件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

1. 三维缺失型

三维缺失型暴露出当城市发展在技术、组织、环境维度同时存在核心短板时，不利于城市居民幸福感提升。此类型包括路径 L1 和 L3：前者技术－组织－环境维度均存在边缘条件缺失情况，涉及景德镇、荆州等地；后者技术－环境维度均是核心条件缺失状态，而在组织维度存在边缘条件缺失，包括鹰潭、孝感等地。此类型突出各维度要素缺失使得城市发展动力不足，不利于居民幸福感提升，也就表明对于城市发展相对薄弱地区而言，需要围绕技术、组织、环境系统性布局发力，来释放城市发展对居民幸福感的积极影响。

2. 组织－环境缺失型

组织－环境缺失型凸显了城市发展过程中，即便在技术维度存在核心条件，但当组织维度和环境维度的核心条件缺失时，仍会导致非高居民幸福感，此类型包括组态 L2、L4、L5、L6，均以技术维度的技术从业人员为核心条件，但无论是否有技术创新产出、产业组织结构、交通便利程度作为边缘条件，都因同时在组织维度和环境维度的核心条件缺失，无法扭转非高居民幸福感的结果。

这种类型以岳阳、抚州、鄂州、益阳、萍乡等城市为典型代表，表明当产业组织结构和区域开放程

度, 或者创业活跃程度和交通便利程度, 又或是创业活跃程度和区域开放程度同时存在严重短板时, 有城市发展其他因素的支撑, 仍不利于居民幸福感持续提升, 这也意味着此类城市应该着力围绕组织、环境维度发力, 以此释放城市发展提升居民幸福感的积极效应。

4.4. 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研究的可信性, 参考叶阁泽和黄山松[8]的研究, 通过调整 PRI 一致性和改变原始一致性阈值两种方法进行检验。将原始一致性阈值调整至 0.85, 结果与原组态保持一致; 将 PRI 一致性阈值调整至 0.85 时, 调整后的分析结果组态数量有所减少, 但仍属于原组态的子集。因此总体上看, 该结果符合 fsQCA 研究稳健性检验标准, 因此上述研究具有稳健性。

5. 结论与启示

5.1. 结论

以长江中游城市群 28 个地级市为对象, 基于 TOE 框架, 借助 fsQCA 方法从技术、组织、环境维度考察了城市发展多元因素影响居民幸福感的组态路径, 研究发现:

第一, 居民幸福感受到城市发展多因素联动作用, 而城市发展的单一条件变量并不构成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必要条件。第二, 导致高居民幸福感的 4 条组态路径可以归为三维协同、组织驱动、组织-环境联动三种模式。其中, 三维协同模式表明提高居民幸福感的理想状态是城市技术、组织、环境协同联动发展; 组织驱动模式突出产业组织结构与创业活跃程度的显著影响; 组织-环境联动模式反映产业组织结构与区域开放程度的重要影响, 意味着此两种发展模式仍需围绕强化技术创新投入与产出发力。第三, 导致非高居民幸福感的城市发展类型包括三维缺失、组织-环境缺失两种, 表明当城市发展的技术、组织、环境均不足, 或当有一定技术驱动, 但组织和环境维度发展缺少核心条件时, 都不利于提高居民幸福感。

5.2. 启示

基于前述分析, 提出如下发展启示。

其一, 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要坚持系统思维, 构建多维度民生支持体系。居民幸福感受到城市发展中技术、组织、环境多维度要素交织的影响, 因此城市发展需要系统规划, 统筹推进技术创新投入与产出应用、调整产业结构与增强市场主体活力、提高区域开放度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推动城市技术发展、组织重塑与环境优化协同发展。

其二, 要结合城市发展基础采取差异化路径提升居民幸福感。针对处于三维协同发展模式的武汉、长沙、南昌等中心城市, 持续巩固多维城市发展的赋能效应, 通过专项政策扶持、统筹资源配置, 进一步强化技术、组织、环境三维耦合效能。同时, 补齐发展短板, 聚焦高端人才集聚引育、提高基建便利程度等方面, 通过城市全方位高质量发展夯实居民幸福根基。针对依托组织驱动模式, 目前产业基础相对扎实的城市, 应在持续巩固产业优势的同时, 通过完善产业扶持政策、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壮大特色产业集群等方式, 推动产业持续转型升级, 并通过拓宽居民就业创业渠道, 激活城市发展动力。与此同时, 需重点围绕加大技术创新、人才引育、构建开放包容的区域营商环境, 来释放技术与环境维度提升居民幸福感的积极影响。针对依托组织-环境联动模式的城市, 在持续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释放区域开放度高的吸引力基础上, 着力强化人力资源积累与技术创新, 通过设立创新专项基金、扶持科创中小微企业、落实企业税收优惠与扶持政策等举措, 强化技术创新投入与产出能力, 激活技术赋能效应来提升居民幸福感。此外, 对于尚且处于非高幸福感发展路径的城市而言, 要警惕三维缺失, 特别是组织-环境

同时不足的低端锁定限制, 应立足整体, 通过健全制度保障体系、加大公共资源投入、积极承接产业转移等方式来优化产业组织结构、激发创业活力、提高开放程度, 并重视推进技术创新建设, 多维度促进城市发展, 稳步提升居民幸福感。

其三, 坚持区域一体化发展, 强化区际合作。一方面, 以整体提升居民幸福感为导向, 通过产业协同、交通互联、服务共享和生态共治强化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际合作; 另一方面, 发挥中心城市引领示范和辐射带动作用, 通过技术创新外溢、产业重组布局、环境协同改善来锻长板、补短板, 着力突破仍处于非高居民幸福感发展路径城市的困境。

基金项目

武汉科技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训练项目“城市发展如何提升青年幸福感? ——基于长江中游三个省会城市的实践分析”(D202502192155203148)。

参考文献

- [1] 高国力, 龙茂乾. 准确把握新型城镇化阶段性趋势性特征[J]. 新型城镇化, 2026(3): 20-23.
- [2] 李朝鹏, 李思蕊, 金中国. 人民城市理念下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内在逻辑与实践历程的再审视[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 46(2): 26-37.
- [3] 刘超, 任阳军, 田泽, 等. 数字技术发展如何提升城市居民幸福感——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J]. 统计与决策, 2024, 40(23): 55-60.
- [4] 王兆萍, 王沁. 新就业形态城市劳动力工作时间配置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J]. 西北人口, 2025, 46(2): 72-87.
- [5] 董源, 郑晓冬, 方向明. 公共服务对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J]. 城市问题, 2020(2): 82-88.
- [6] 段永彪, 杨青. 城市创新能力影响因素及其效用的元分析研究[J]. 软科学, 2025, 39(8): 42-50.
- [7] 湛东升, 汪子晨, 张文忠, 等. 多尺度城市人居环境感知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基于“四好”建设理念与城市体检数据的分析[J]. 城市规划, 2025, 49(6): 4-15, 110.
- [8] 叶阁泽, 黄山松. “青年发展型”省份何以建成?——基于 fsQCA 的组态分析[J].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 2026, 45(1): 98-112.
- [9] 任致远. 试论中国的城市发展建设经验[J]. 城市发展研究, 2023, 30(7): 1-4.
- [10] 何一民. 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发展 75 年的成就与经验[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 63(5): 1-18.
- [11] 单菁菁. 青年发展型城市的生态赋能路径[J]. 人民论坛, 2025(8): 20-25.
- [12] 邓智团, 唐晓超, 彭青. 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分析框架与中国经验[J]. 城市发展研究, 2024, 31(2): 1-7.
- [13] 陈一迪, 张蕾, 武继磊, 等. 数字经济下我国城市群发展与信息技术人才空间分布的关联研究[J]. 统计研究, 2025, 42(7): 121-132.
- [14] 彭文斌, 狄亚轩. “三生”空间视角下城市更新的时空演变、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例[J]. 人文地理, 2026, 41(3): 56-68.
- [15] 王洁菲, 姚树洁, 张谦. 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居民互联网依赖的幸福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53(2): 99-113.
- [16] 陈志, 闫晗, 张经纬. 数字经济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 CGSS 微观数据的实证[J]. 统计与决策, 2025, 41(14): 94-99.
- [17] 何启志, 考佳琪, 刘燕虎. 居民幸福指数的统计测度与时空演变特征[J]. 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 2025, 49(4): 117-129.
- [18] 肖枝洪, 钟林. 数字经济对中国居民幸福度的影响分析[J]. 软科学, 2025, 39(6): 78-88.
- [19] 胡荣, 施苏原. 城乡居民的社会比较与主观幸福感[J]. 社会科学研究, 2026(2): 132-141.
- [20] 吴军. 城市场景如何影响居民生活幸福感?——基于场景理论视角的分析[J]. 城市发展研究, 2026, 33(5): 105-112.
- [21] 倪建伟, 徐荣. 数字时代的公众参与如何影响居民幸福感?——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的实证研究[J].

- 湖湘论坛, 2025, 38(6): 101-114.
- [22] 王珍珍, 丁嘉铭. 数字素养、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幸福感——基于 CFPS 数据的实证研究[J]. 人口与发展, 2025, 31(3): 145-154, 90.
- [23] Kley, S. and Dovbischuk, T. (2024) The Equigenic Potential of Green Window Views for City Dwellers' Well-Being. *Sustainable Cities and Society*, **108**, Article ID: 105511. <https://doi.org/10.1016/j.scs.2024.105511>
- [24] 赵云辉, 白佳奇, 梁宇奇. TOE 框架下城市韧性的多元驱动模式: 制度逻辑的组态分析[J]. 技术经济, 2025, 44(2): 144-164.
- [25] 王文彬, 刘冰倩, 许冉. TOE 框架下资源型城市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路径研究——基于 114 个城市的 NCA 和 fsQCA 分析[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6, 40(5): 12-22.
- [26] 张传勇, 蔡琪梦, 杨力. 智慧城市建设与居民幸福感: 基于 CLDS 数据的实证分析[J]. 社会科学, 2023(1): 128-140.
- [27] 魏海湘, 魏敏, 许锐.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溢出效应研究——基于居民幸福感的经验证据[J]. 经济学家, 2023(2): 25-34.
- [28] 贾佳, 张晓青, 张文忠, 等. 城市人居环境质量感知对就业人群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J]. 地理研究, 2024, 43(9): 2460-2478.
- [29] 陈之常, 马亚东. 中国城市更新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基于遗传算法投影寻踪和面板空间分位数模型[J]. 管理评论, 2022, 34(8): 43-53.
- [30] 徐芳, 金晓燕. 我国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定性比较分析法(QCA)应用研究的系统审视与未来进路[J/OL]. 图书馆论坛: 1-14. <https://link.cnki.net/urlid/44.1306.G2.20260518.1101.002>, 2026-08-01.